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

JIANGJIESHIJUNSHIFENG YUNLU



烽火硝烟

周彪 编著
华文出版社

3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

——烽火硝烟

周 彪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周彪编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9

ISBN 7-5075-0373-9

I. 蒋…

II. 周…

III. 蒋介石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01 号

蒋介石军事风云录——烽火硝烟

著 者: 周 彪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时立平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7990 63099271

邮 编: 100800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 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47.125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373-9/K·42

定 价: 全四册 75.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怎一个“安内”了得…………… (1)

- 日本人的“一帘幽梦”
- 十九路军“不解风情”
- 末代皇帝唱戏谁搭台
- 安内：今生今世的迷梦
- 百姓们，勿问国事
- “礼义廉耻”的英文读法
- 蒋介石的对日“宣言”
- 西安事变

第二章 “枭雄”之初…………… (6 9)

- 1937 年，鬼子进了中原
- 握握手，还是好朋友
- 可怜无数山
- 任是血腥也动人
- 南京：含泪的日子
- 好个“无情的情人”
- 咱们还能和平？

第三章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39)

- 杀了韩复榘 吓死个刘湘

- 升了自己的官
- 光荣之地
- 蒋介石的“新战略”
- 黄河与悲愤共流
- 大武汉,1938
- 放火的放火,殉国的殉国
- 跑了“二把手”,又折“一只手”
- 美国,你在想什么

第四章 战与不战之间…………… (219)

- 中国战区第一人
- “小兄弟”的滋味
- 荣誉与阴谋
- 谁说蒋介石是“花生米”?
- 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一纸空文:《中国之命运》
- 在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第五章 还我河山,“我”却是谁…………… (286)

- “雅尔塔”又被人蒙了一把
- 百年一反攻
- 日本——梦醒时分
- 汪伪满蒙:大难临头何处飞
- 荒漠甘泉的追寻
- 你开会,我也开会
- 你当家还是我作主
- 天欲老,人知否

第一章 怎一个“安内”了得

●日本人的“一帘幽梦”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带给中国最多伤害的国家是日本。

日本在自己的国力刚刚崛起之际，便开始了它的嚣张。到了二十世纪初，这嚣张成了飞扬跋扈和“一帘幽梦”。

侵朝鲜、占台湾，早已不再满足日本军国主义的梦想。它慢慢有了更残酷、更狂野、更“美妙”的设想，那便是：征服中国。

它要把“梦”变为现实。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俨然以整个东方的代理人自居。会议确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政策大纲》云：满蒙是日本臣民的“生命线”，要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

此后不久的《田中奏折》又说：“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领土尚未实现。”“惟欲征服中国，必

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连“墨”字底下之“土”不肯让与日本人的张作霖，自己却在日本人的炸弹中烟消云散。

到了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变本加厉，一面鼓吹“为了民族生存而向满蒙发展，此乃堂堂生存权力之主张”，一面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策划。

而当时南京政府“策划”的，却是“安内”。身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国民政府头等权力的蒋介石，一边“围剿红军”，一边“混战新军阀”，比日本人更忙。

日本人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整个东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凉境界。1931年7月，在吉林省长春县境内的万宝山，日本人唆使朝鲜侨民非法挖渠筑坝，挑动中、朝农民间发生冲突，并借“保护”之名打伤中国农民，在朝鲜掀起反华情绪，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而同年8月的“中村事件”则把东北危机推上顶点。“中村事件”的主角中村震太郎奉日本参谋部之命潜入东北军军事禁区从事间谍活动，因发现后，证据确凿被处死。日本借机纠缠不休，图谋付诸武力，四处集结军队于沈阳。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兵“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放在铁轨下（柳条湖附近），并点了火。”然后诬陷东北军所为，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开始了他们征服中国的“伟大进程”。

远在北平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听”到了那声巨响。那时他正在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参谋长荣臻也“听”到了那隆隆炮声，他刚为其父祝罢寿诞；进入梦乡的东北军官兵将士，也都从睡梦中惊醒。

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上至张学良，下至士兵，都在等待，一种奇怪的等待，一种枪口下流弹旁的等待——等待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

其实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白：不抵抗。在“万宝山事件”中，蒋介石便通电张学良，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蒋介石的“机会”便是“安内”。他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于是东北军等来的是这样的一串命令：

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想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

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

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日军此次，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东北军的“一时之愤”便这样被压了下来。当时，东北军在东北驻军 16 万之众，省防军、非正规军武装力量 4 万余

人。有些部队装备精良。而日本关东军仅1万多人，事后增兵至2万多。东北军以十抵一，却在蒋介石的一串命令下悄然撤退，任人杀戮。

而对于外界，对于国民，蒋介石却有不少漂亮的“说法”。

面对汹涌的记者群和如潮的提问，蒋介石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却镇定自若地给“不抵抗”做诠释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好一个“无有组织之报复”！抵御外侮反倒成了报复，这便是蒋介石的逻辑。

9月23日，风尘仆仆从“剿共”前线归来的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讲演时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党员”们听懂了：“上下一致”便是听从“绝对不抵抗之命令”；“公理对强权”就是在子弹飞来，做了亡国奴后说你错了日本……

同样是9月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内称：“政府现在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定之态度。”

这种“严肃镇定”带来了东北三省的快速沦陷，把东北人民带入亡国奴的深渊。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日军攻占沈阳。虽然“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虽然有的士兵深有“我们几时反攻回来”的疑问，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他们边挨打边撤退，离开北大营。9月19日晨，日军攻占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9月20日，日军继续侵至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飞机驰于空中并时有扫射，坦克车横行沈阳城，商民颇多伤亡。到21日夜間，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局均被攻破，日本人取得了首场胜利。

撤退的“国军”进驻锦州，得胜的日军穷追不舍。1931年底，日军集结于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20列火车，进攻锦州、山海关。当时警务处长黄显声电请张学良，张学良再次贯彻蒋介石的外交方针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可率队退入关内。于是辽宁省沦陷。

与此同时的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也风雨凄迷。便在同样的9月18日，日军向长春进攻，长春市政筹备处周斗钦请示吉林省当局，回答是：不准抵抗。于是周斗钦派市公安局局长余修长向日方通知：长春市“坚决执行”吉林指示的不抵抗命令。日本领事馆领事田代对此种政策表示“非常满意”。从此“国军”仓皇撤退，日军不费枪弹占领长春，可笑的事也随之层出：余修长维护长春“秩序”有功，被提升为吉林全省警务处长。

辽吉二省沦陷后，黑龙江成了孤家寡人。日军对于黑省，必欲取而甘心。初时盅惑逃辽镇守使张海鹏北犯，日军随后。马占山（当时黑省主席）率队击溃张军。日军看张氏军队太弱，自11月始借故派军攻击嫩江桥。其时马占山部亦是“严

令只许防御，不得攻击”。但在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之下，忍无可忍，在嫩江桥、三间房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虽是边打边退，马占山依然成了一时的“英雄”，在上海甚至出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马占山在汉奸与日本的双重诱导之下，在国民政府“反对抵抗”的基调中，于1932年2月降日，并就任伪职，伪职宣言中称：“此次东北事变，我黑龙江省因一时误解，不幸引起战争，演成混乱局势，以至人民受此涂炭……占山猥以轻材，自知原非胜任……此番赖日本友邦表示无领土之企图，互作经济之提携，从此有善邻好意之援助，真诚之亲善……黑省前途，实利赖焉……”

一片冠冕堂皇之中，马占山将黑龙江交给了日本，后来“马占山”牌香烟亦停止出售。

正当日寇在东北四处横行、奸淫掠夺之际，国民政府在干啥？蒋介石在干啥呢？蒋介石正做着自己的总统之梦，国民政府正实行政治的权力再分配。

其时宁、粤两个中央、两个政府正分庭抗礼，蒋介石妄图一举“和平统一”，做举国大总统，粤方则欲先除蒋而后快。“九·一八”之后，抗日反蒋的呼声使蒋介石陷入被动局面；他抛出“抛弃分异，联合救国”的旗号，企图实现宁、粤合作，企图实现全国“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要求各方“信任政府，整齐步伐”。而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则利用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力图扳倒蒋介石。

一场磕磕碰碰之后，以“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为称号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分成南京、广州两方

召开。1931年11月12日，宁方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涕泪交流地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虔诚悔过”的模样，另一方面又对反蒋派东斥西责，要求反对派甘当无名而光荣的“华盛顿”、“岳武穆”，来维护和造就他自己——有名的“华盛顿”或“岳武穆”。

在广州，粤方的国民党“四大”更是吵闹不休，各政客、各官僚、各军阀都力图除掉异己势力，把会场弄得一团糟。三番五次争斗下来，广州“四大”又分出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上海“四大”。

但无论广州“四大”与上海“四大”，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反蒋、逼蒋下野。蒋介石看到国内、党内形势不利，便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决定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海陆空军总司令职务，但又标榜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而辞职，是一种“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之举，并且“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果然，月余之后，即1932年1月，蒋介石再次回到南京，并提出臭名昭著的“抗日亡国”论，称“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计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指林森）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蒋介石要尽怎样的“天职”呢？不得而知。而日本，根本也不在乎不理睬他。侵占东北三省后，日本的胃口更大，梦也愈做愈疯狂。

他们，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

●十九路军“不解风情”

日本人看准了国共难容（其实是国不容共）之际中国的混乱，也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

初尝禁果的日本人对东北的胜利信心大增，他们想如拿下东北一样，拿下中国的最大都市——上海。

没有人担心蒋介石敢抵抗，对这点日本人很放心。只是没有想到，在上海有另一群“不解风情”的人物：十九路军。

日本人的挑衅自1932年1月中旬开始。在上海的闸北区，有日僧5名和三友实业社工人的纷争，这场纷争形成了群殴，最后一日僧被打伤，不治而死。日本借机煽动日侨聚集，要求中国惩处“凶手”，赔偿损失。为了报复，1月20日，日本暴徒冲进了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厂房。然后，“全体侨民”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海军前来上海，以“保护侨民”，以“行使自卫权，以期灭绝抗日活动”。

1月21日，日本领事村井就上述“和尚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等。26日又发出最后通牒，说48小时内没有“满意之答复”，日本将“自由行动”。同时，大批日军正来华进驻，加紧备战。

此时的蒋介石时已“不问政事”，住在溪口，但上海已是一触即发。在此前夕，蒋介石派张静江前来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转达蒋之意：“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

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却看不到话中之“深意”，他不懂“上海是我国领土”，而中国军队如何无权驻于上海？蔡说：“张先生亦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即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请向蒋总司令报告。”

就这样，未打日本，蔡的话先给了蒋介石“迎头一击”。而“不解蒋总司令风情”的十九路军却达成精诚团结，总司令蒋光鼐在十九路军的紧急军事会议上称：“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警备司令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最后，在发往各军部的密令中，十九路军要求各将士“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定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

十九路军，终于喊出了抗日第一声。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的天通庵路发动对十九路军的突然袭击。十九路军当即反击，瞬时光火冲天。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建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各部推进。天亮之时，日本飞机也争先恐后地出动，一阵狂轰滥炸。在十九路军强大反攻下，各路日军带着伤亡于晚上败退。

29日上午，十九路军通电全国，表明抗日之决心：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轡。

十九路军不仅留下了这正气的文字，也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行动。

日军“4小时内占领上海”的叫嚣破产后，大量增兵。到1月底，再次进攻闸北。从1月31日开始的第一周，战斗始终在闸北进行。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将战火烧到江湾、吴淞一带。激战9小时之后，日军全线撤退，日军总指挥官盐泽幸一被免职，调回日本。

接替盐泽幸一的指挥官是野村。2月11日，日军的飞机加大炮冲向闸北，冲向蕴藻浜、曹家桥，双方战到了肉搏之势，日军被击退。同时日军向吴淞进攻，毁掉了吴淞的炮台。

野村不行，再换成植田谦吉。植田谦吉的目的成了“迫使十九路军撤退”，不再提盐泽的“4小时占领上海”之语。

然而2月正是战斗最苦的季节。在江湾，在庙行镇，在浏河，都发生激烈的战斗，飞机、坦克、大炮的轰鸣，战火与血肉的交错迭映，构成了数不清的英勇。

帮助十九路军作战的，是张治中的第五军（由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火炮营组成）。但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接到任命后，已是2月下旬，在张治中的《告全军将士书》说：“本军此次奉命来沪，协同十九路军战……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

第五军的参战，壮大了第十九路军的力量，日本政府也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替换了总攻不成的植田，增派日军至9万多人，疯狂反扑。到3月份，中国守军背腹受敌，无力增援，只好退守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

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我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抗战，非求一隅之胜负，与彼虏争一日之短长，乃欲以此仅存血肉，以救国牺牲，作同胞马前之导卒耳。

这“马前之导卒”做得太不容易。此战之初，蒋介石尚是在野身份，但他也“慷慨激昂”地说过：“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但他依然认为要“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一开始便给了十九路军一个大大的帽子：只有虚浮之豪气！

“不呈豪气”的蒋介石把国民政府的首都迁到了洛阳，却又胡说什么要“与日本长期作战”之意。2月13日，蒋介石亲自赶到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的胜利，及早收束，避免再战为主”。但十九路军偏偏不解“蒋总指挥”的“关怀”，仍然奋战不休。

2月23日，十九路军派参谋长前来求援，蒋答曰：“各部队俱未集中！”甚至说：“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当时驻在无锡、苏州一带，驻在浙江、江北、杭州一带的兵力约为60个师，都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按兵不动，坐视第十九路军孤军苦斗。

不仅如此，从1931年10月起，十九路军便从未领到过军饷分文。国民政府的借口是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蒋的嫡系部队却照发不误。当时中国海军则与日本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为了这“友谊”，海军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看日舰运来军队、物资，看日军逞凶上海。

为淞沪抗战献出伤亡1万多人惨重代价的十九路军，莫非真的犯有“爱国罪”？如何受到如此之待遇？

说穿了，只有一个原因，十九路军非蒋介石之嫡系；十九路军不解蒋总指挥的风情所在。

但“不解风情”的十九路军，却比蒋介石更能赢得民众。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他们从抗战爆发后所收到的民众支持状况：

“海内外人民知道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抗战后，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也有的寄衣物食品等慰劳我们。”

“东北冯庸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